



苍天呀苍天，我并不要知识，我并不要名誉，我也不要那些无用的金钱，你若能赐我一个伊甸园内的“伊扶”，使她的肉体与心灵，全归我有，我就心满意足了。

# 郁达夫与王映霞

许凤才◎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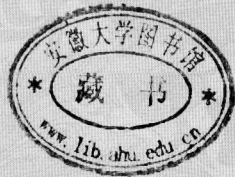


苍天呀苍天，我并不要知识，我并不要名誉，我也不要那些无用的金钱，你若能赐我一个伊甸园内的“伊扶”，使她的肉体与心灵，全归我有，我就心满意足了。

YUDAFU YU WANGYINGXIA

# 郁达夫与王映霞

许凤才◎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于宏雷

封面设计:肖 辉

版式设计:韩 晔

责任校对:周 昕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郁达夫与王映霞/许凤才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2

ISBN 978-7-01-011121-6

I. ①郁… II. ①许… III. ①郁达夫(1896~1945)-生平事迹②王映霞  
(1905~2000)-生平事迹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79084 号

### 郁达夫与王映霞

YUDAFU YU WANGYINGXIA

许凤才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1

字数:30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11121-6 定价:4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 目 录

|               |     |
|---------------|-----|
| 欲将沉醉换悲凉 ..... | 1   |
| 黄浦江畔映彩霞 ..... | 6   |
| 沙漠绿洲 .....    | 6   |
| 云遮雾障 .....    | 25  |
| 轻风细雨 .....    | 56  |
| 阳光灿烂 .....    | 78  |
| 琴瑟和谐神仙侣 ..... | 89  |
| 惊涛骇浪 .....    | 89  |
| 珠连璧合 .....    | 98  |
| 温馨港湾 .....    | 108 |
| 花好月圆 .....    | 117 |
| 携手并肩立潮头 ..... | 126 |
| 《民众》新生 .....  | 127 |
| 挑战“新月” .....  | 130 |
| 论争“创造” .....  | 134 |
| “奔流”崛起 .....  | 139 |

## 郁达夫与王映霞

|                 |     |
|-----------------|-----|
| 提倡“大众” .....    | 144 |
| 怒吼“自由” .....    | 148 |
| 友情似火 .....      | 152 |
| 沪杭鸿雁 .....      | 160 |
| 举家迁杭隐山林 .....   | 165 |
| 旅途艰难 .....      | 165 |
| 裂痕重重 .....      | 176 |
| 美哉西湖 .....      | 188 |
| 尘埃落定 .....      | 192 |
| 湖山清处遍题名 .....   | 195 |
| 碧海蓝天 .....      | 195 |
| 湖光山色 .....      | 200 |
| 秋韵醉人 .....      | 205 |
| 涛声依旧 .....      | 208 |
| “风雨茅庐”多风雨 ..... | 211 |
| 大风圈外 .....      | 211 |
| 长袖善舞 .....      | 219 |
| 展痕处处 .....      | 226 |
| “闲人”不闲 .....    | 234 |
| 风雨茅庐 .....      | 236 |
| 春云秋梦已如烟 .....   | 244 |
| 蛮府参军 .....      | 244 |
| 闽游滴沥 .....      | 250 |
| 疑窦丛生 .....      | 255 |
| 烽火满天 .....      | 263 |

|                   |     |
|-------------------|-----|
| 此恨绵绵无绝期 .....     | 276 |
| 心灵洗礼 .....        | 276 |
| 魂牵梦绕 .....        | 281 |
| 南洋遗恨 .....        | 285 |
| 是非曲直 .....        | 295 |
| 《毁家诗纪》的多维诠释 ..... | 303 |
| 主要参考书目 .....      | 331 |

## 欲将沉醉换悲凉

辛亥革命的前夜,大约是1910年的深秋时节,美丽的西子湖畔,温馨的杭府中学里,时常会有两个相貌、性情和衣着都迥然不同的少年在徘徊吟唱,甚是引人注目。其中的“一个是身体生得很小,而脸面却是很长,头也生得特别大的小孩子”,名曰徐志摩,海宁县硖石镇富商之子。“无论在课堂上或在宿舍里,总在交头接耳的密谈着,高笑着,跳来跳去,和这个那个闹闹,结果却终于会出其不意地做一件很轻快很可笑很奇特的事情来吸引大家的注意的。”然而让人惊奇的是,“头大尾巴小,戴着金边近视眼睛的顽皮小孩,平时那样的不用功,那样的爱看小说——他平时拿在手里的总是一卷有光纸上印着石印细字的小本子——而考起来或作起文却总是分数得最多的一个”。(郁达夫《志摩在回忆里》)

与肉色细白,锦衣玉食的徐志摩形成鲜明对比的另一位少年同学——个头矮小,“前额开阔,配上一副细小眼睛,颧骨以下,显得格外瘦削”。(《王映霞自传》)此乃富阳才子郁达夫,绰号“怪物”。相貌虽然不很阳刚,衣着也稍显粗糙和土气,既不善与人沟通交流,“说话也不大会说”,但“做起文章来,竟也会得压倒侪辈”。尤其是旧体诗词的创作,“接二连三地在一册红格子的作文簿上写满了”。享誉东南半壁的《全浙公报》、《之江日报》和上海的《神州日报》,不断有其化名之作发表。

谁能料到,杭府中学的这对“宝贝”——“顽皮小孩”和“怪物”,十几年后,竟能在“五四”新文坛上声名鹊起,领一时之“风骚”,重要的还是他们各自都演绎出了一场旷世绝伦的“爱情”悲壮剧。

## 郁达夫与王映霞

徐志摩杭府中学毕业后，先是师从梁启超，尔后是留学欧美，再至故都主编《晨报副刊》，又到上海领衔“新月社”，并以一卷《志摩的诗》风靡大江南北，黄河上下。他的诗“在感情的宣泄、意境的营造、节奏的追求和形式的探究诸方面，都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启迪，体现其特殊的美学价值”。（《徐志摩诗全编·出版说明》）

正当徐志摩在京华新诗坛上一枝独秀、高歌猛进时，郁达夫在上海也同样是英姿勃发，笑傲黄浦江畔，畅怀十里洋场。

与徐志摩相比，郁达夫离开杭府中学后的经历稍微曲折些，先是辗转于之江大学预科、惠兰中学，尔后是回故乡索居独学，又漂洋过海到日本求学。1921年与郭沫若等人在东京组织创造社，再至上海主编《创造月刊》，同年处女作《沉沦》问世。

《沉沦》是新文坛上的第一部白话小说集，一经出版，京沪等地，一时“洛阳纸贵”。青年学生“对于他的热烈的同情与感佩，真像《少年维特之烦恼》出版后德国青年之‘维特热’一样……”（匡亚明《郁达夫印象记》）许多人“效仿”着小说里主人公的衣着打扮和言行举止，故意装出一副忧郁的神态，以示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和反抗。

杭府中学的“顽皮小孩”和“怪物”，不但在新文学创作上取得了辉煌成绩，名存史册，万古流芳，而且在打破封建婚姻桎梏，大胆地追求婚姻自主、自由等方面，也同样是轰轰烈烈，惊天地泣鬼神。

徐志摩与结发妻张幼仪离异后，先是与才女林徽因“热恋”了一阵子，继之便是发飙般的追逐京城名媛陆小曼。

对徐志摩的浪漫情怀和风流韵事，郁达夫不但理解，而且是真心实意地表示支持和赞颂。在《怀四十岁的志摩》里有言曰：

他和小曼的一段浓情，在他的诗里，日记里，书简里，随处都可以看得出来；若在进步的社会里，有理解的社会里，这一种事情，岂不是千古的美谈？忠厚柔艳如小曼，热烈诚挚若志摩，遇合在一道，自然要发放火花，烧成一片了，哪里还顾得到纲常伦教？更哪里还顾得到宗法家风？当这事情正在北京的交际社会里成话柄的时候，我就佩服服志摩的纯真与小曼的能敢，到了无以复加。记得有一次在来今雨轩吃饭的席上，曾有人问起我以对这事意见，我就学了《三剑客》影片里的一

句话回答他：“假使我马上要死的话，在我死的前头，我就只想做一篇伟大的史诗，来颂美志摩和小曼”。

这里名为赞美徐志摩、陆小曼的伟大爱情，和勇敢的叛逆精神，实际上是夫子自道，所讲的情理又何尝不是他自己的切身体验呢？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郁达夫也是深受其害的。1923年在《茑萝行》中借主人公之口所表白的一段话就是明证。

我十七岁去国之后，一直在无情的异国蛰住了八年。这八年中间就是暑假寒假也不回国的原因，你知道么？我八年间不回国来的事实，就是我对旧式的，父母主张的婚约的反抗呀！这原不是你的错，也不是我的错，作孽者是你的父母和我的母亲。但我在这八年之中，不该默默的无所表示的。

后来看到了我们乡间的风习的牢不可破，离婚的事情的万不可能，又因你家父母的日日的催促，我的母亲的含泪的规劝，大前年的夏天，我才勉强应承了与你结婚。但当时我提出的种种苛刻的条件，想起来我在此刻还觉得心痛。我们也没有结婚的种种仪式，也没有证婚的媒人，也没有请亲朋来吃酒，也没有点一对蜡烛，放几声花炮……

是啊，有所爱而不能去爱，没有爱而又不得不去爱的婚姻，无疑，是对青年男女性灵的摧残，生命的吞噬。

郁达夫和孙荃婚后所承受的种种痛苦，以及理想幻灭后的悲哀，在他的小说、散文、诗词里多有流露。如在《一封信》里，说到“恋爱”一词时他感慨道：“我自见天日以来，从来没有晓得过什么叫做恋爱。运命的使者，把我从母体里分割出来以后，就交给了道路之神，使我东游西荡，一直飘泊到了今朝，其间虽也曾遇着几个异性的两足走兽，但她们和我的中间，本只是一种金钱的契约，没有所谓“恋”，也没有所谓的“爱”的。

“五四”新文坛上，敢于抛弃世俗的理念，反抗包办的婚姻，热烈地追求爱情，徐志摩和陆小曼是开风气之先的，他们的结合如晴天霹雳，将一些传统的“卫道”士们震得晕天雾地，不知去向。

受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影响和启发，郁达夫也决意跳出传统礼教的囚笼，不再逆来顺受做封建婚姻的牺牲品，要走属于自己的路，开拓婚姻自主、自由的新天地，使心灵得到真正的解放和超脱。《沉沦》中主人公的呐喊，表

## 郁达夫与王映霞

达的就是他的真实想法。

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安慰我体谅我的“心”。  
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一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从同情而来的爱情!

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

若有一个美人,能理解我的苦楚,她要我死,我也肯的。

若有一个妇人,无论她是美是丑,能真心真意的爱我,我也愿意为她死的。

我所要求的就是异性的爱情!

苍天呀苍天,我并不要知识,我并不要名誉,我也不要那些无用的金钱,你若能赐我一个伊甸园内的“伊扶”,使她的肉体与心灵,全归我有,我就心满意足了。

这赤裸裸的性饥渴、性苦闷的呼叫,是那个时代“新青年”们所共同的心声。

一代“诗哲”徐志摩觉悟了,勇敢地踏入了“禁区”,尝试了“爱情”的甜蜜果实,郁达夫紧步后尘,也很快在新文坛上掀起了“爱情”大战的滔天巨浪。1927年1月4日,他在留日同学孙百刚的家里,碰上了梦中苦苦追求的情人——王映霞。

王映霞既是大家闺秀、名门千金,又是引领时代新潮的洋学生,年方二十,像一株含苞待放的牡丹,格外鲜艳美丽、楚楚动人。

郁达夫与她相识片刻之后,内心就激烈地冲动起来,在回家的路上,看着满街阑珊的灯火,忽然感到自己仿佛是在回顾生命的历程。过去的岁月,都如同在漫漫黑夜里的长途跋涉,虽然也曾有微光亮点的慰藉和温暖,但企盼和渴望的那璀璨闪烁的火花,却从没有真正出现过。

在他的眼里,王映霞既像一株出水的芙蓉,是那樣的清纯,那樣的苍翠欲滴,给人以精神,给人以力量。同时,她又像一朵春雨后盛开的牡丹,是那樣的艳绝绝伦,国姿天香,令人陶醉,使人无限遐想。

郁达夫醉了,真的醉了。

为了这株芙蓉,为了这朵牡丹,他使尽了浑身解数,展开了“如猛火电光”般的凌厉攻势,终于抱得佳人归。

屠家骥、张方晦在《飞去的诗人》一书里，论及徐志摩和陆小曼的感情世界和现实生活的关系时，有一段话讲的很是精辟透彻。

志摩深深地、深深地爱着小曼。他透过那两片理想的水晶似的深度近视镜片去看待爱情和人生，看到的是至高无上的、纯净的、诗意的、神圣的理想境界。其实这境界只是他自己心灵折光里的海市蜃楼。在那里，爱人是圣坛之上的神祇，永远带着启迪你心智的微笑，倾听你的祈祷，用她那永恒的温柔抚慰你的心灵，给你以无穷的愉悦和温暖……然而，一接触现实，当神灵被一个血肉之躯的女性所替代，神性的完美便消散了，接踵而来的是现实生活中许许多多令人烦忧、令人束手无策的问题……爱情是一个纽带，可以把两个人的心灵和身体联结在一起，却难以使他们的生活习惯、趣味爱好、人生目标一下子变得完全丝丝入扣。对现实生活抱着过于理想化的要求的人，就不可能不时时感到失望和遗憾了。

徐志摩的经历正是从云端坠入尘埃，而不能自救，最终消失在常常仰望的天空，结束了短暂的 36 岁的生命。

徐志摩走了，是那样的突然和无奈，给世人留下了太多的遗憾和思考。表面上看起来，他的英年早逝，纯属偶然的“天灾”所致，实际上这是与陆小曼的情感“走私”和腐化堕落的生活密不可分的。

无独有偶，郁达夫和王映霞婚后没几年，也很快出现了感情危机，最终是劳燕分飞，各奔东西。

王映霞贪图富贵，酷爱虚荣。是她逼着郁达夫将著作版权拱手相让，以至身无分文；是她唆使郁达夫离开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中心——上海，到宁静的山水间浅吟低唱；是她引诱郁达夫结交权贵，置身尔虞我诈的官场……如果没有她的种种行为，也就不可能导致郁达夫远赴南洋，以身饲虎。

再三连四地将郁达夫与徐志摩拉在一起相比较，其意是在说，“五四”新文坛上，高扬婚姻自主、自由大旗的郁达夫、徐志摩不但有着共同的文化教育背景和社会阅历，而且在情感世界和婚姻道路的选择上，也有太多的相似之处。

如果能将郁达夫和王映霞的爱情历程，婚姻之路探索个清楚，研究个明白，对同时代人，尤其是对鲁迅、郭沫若、徐志摩等心灵深处的窥视，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等方面都将是大有裨益的。

## 黄浦江畔映彩霞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吧！1911年，郁达夫告别初恋的故乡少女赵莲仙时，曾有一缕“水样的春愁”在心中荡漾，但伴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缕春愁很快就湮灭在了杭州的湖光山色之中，之后便是与第一任妻子孙荃的洞房花烛；15年之后，当他在广州依依惜别文坛新星、“红颜知己”白薇时，也有一缕淡淡的哀愁在心头缠绕，巧合的是，这缕哀愁，随着大上海灯红酒绿的闪烁，同样很快就消散得无影无踪，紧接着便是与第二任妻子王映霞的喜结良缘。

## 沙漠绿洲

郁达夫与王映霞从一见钟情，迅速热恋，再到闪电式缔结良缘，这其中既有二人性格、气质、文化素养、家庭教育诸方面的因素使然，也有彼此生存空间危机等外力的作用，而更多的则是为波澜壮阔的时代浪潮所席卷激荡。

如果没有20世纪初叶风起云涌、气象万千的社会大变革、大动荡、大分化，他们二人相遇的机会是很少很少的，洞房花烛，同枕度春宵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

先从郁达夫的经历说起。1926年的阳春三月，与郭沫若、王独清等创造社同仁应邀奔赴广州时，他确实是想在那里“改变旧习，把满腔热忱，满怀悲愤，都投向革命中去……”（郁达夫《〈鸡肋集〉题辞》）轰轰烈烈地干一

番惊天动地,解救万千民众于水火的大事业,以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崇高理想。然而,广州也并非是革命者的天堂、人间理想的乐园,种种不如意,形形色色的卑鄙和污浊,也同其他地方一样触目可见,伸手可及,特别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新政府的倒行逆施,横征暴敛,更是使他感到痛心失望,幻想破灭了,一种难以言状的痛苦也随之而生。

虽不满于广州国民革命政府的倒行逆施,愤慨于蒋介石等新军阀的卑鄙污浊,但心灵深处并没有产生马上要离开的意思。因为这里毕竟是革命的策源地,人心向上,朝气蓬勃,各种新生事物如雨后春笋……这些都是旧军阀盘踞的北方所无法相比的,再加上生活相对安定,收入又丰,一时难以下决心远赴他乡另谋高就。促使他决计离开南国,重回上海主持创造社出版部,专做文学生涯的是成仿吾、王独清、蒋光慈等人的大力劝说和诱导。

创造社出版部是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人苦心经营起来的,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1926年他们南下广州后,就将经营管理方面的诸项事宜全权委托给了周全平、潘汉年、叶灵凤等一批文坛新秀。平心而论,这一批“小伙计”确实是为创造社出版部的发展出了大力。冯乃超在《鲁迅与创造社》一文中对此曾有过很中肯、很公允的评价,说是他们的一番努力工作才“使整个创造社改涂了一番面貌……”

随着创造社出版部的日益发展壮大,周全平、潘汉年、叶灵凤等人相应地在新文坛上脱颖而出,名声也越来越大,渐渐地开始不满足于“小伙计”的角色,想发出自己的声音,建立自己的出版阵地,标榜自己的旗号,于是乎,头脑一热,未征求郭沫若等人的意见,几个人一商量,便创办了一种小型周刊,名曰《A11》。这是一种四开八面的小报。刊名看起来很奇怪,很深邃,实际上并没有寄寓什么深意,只不过是当时出版部所在地址的门牌号码而已。

每期刊物,除有1个版面是专门刊载书刊的广告外,其余3个版面大多刊登的是政论和杂文。“泼妇骂街”式的社会短评大都出自潘汉年的手笔。像在教育界、学术界和新文坛上大名鼎鼎的胡适以及因主编《性史》名声大噪、风云一时的张竞生等,都是经常被《A11》攻击嘲笑的对象。

《A11》新颖的形式和嬉笑怒骂的文风很快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但终因锋芒太露,言辞激烈,触动了统治阶级的神经,为反动当局所不容。出版

## 郁达夫与王映霞

了5期之后,便被上海宪兵司令部以没有“登记备案”为借口,禁止出版发行。

不甘寂寞的“小伙计”,在《A11》停刊不久,又创办了新的代言刊物《幻洲》,继续摇旗呐喊,以此来发泄心中的不平和愤怒。

正当这一班“小伙计”,擎着创造社的大旗,顺乎时代的潮流,一往无前的开拓革命文学新领域时,却不幸招来了杀身之祸。1926年8月7日,上海淞沪警察厅突然派人查封了创造社出版部,并捕去了值班的戈仲平、成绍宗、叶灵凤、周毓英等人。后来经过多方营救,被捕去的4人放了回来,遭封的大门也得到了重新启封,但此次打击,既给“小伙计”们的心灵带来了巨大创伤,同时也埋下了日后创造社元老与他们分道扬镳的种子。

在广州的创造社元老们,对在上海主持创造社出版部工作的“小伙计”早就心怀不满了。一是不满他们私自编印小刊物胡言乱语,四处捅娄子;二是怀疑他们账目不清,公饱私囊。再加上这场几乎断送创造社出版部前程的横祸,更加剧了彼此间的矛盾和误解,甚至到了一触即发的境地。而且,广州这边已很明确地要求郁达夫去上海进行整顿。

广州方面整顿创造社出版部的计划和行动,郁达夫在《劳生日记》、《村居日记》里多有记载。1926年11月17日的日记是:

仿吾要我去上海,专办出版部的事情,我心里还没有决定,大约总须先向学校方面交涉款子,要他们付清我的欠薪之后,才能决定。接上海蒋光赤来信,他也是和仿吾一个意见,要我在上海专编《创造》,作文学生涯,然而我心里却很怕,怕又弄得精穷。

这则日记说明,创造社的元老们这时已经不能容忍上海的“小伙计”再继续他们的“幻洲”梦了,并已开始付诸实施整顿计划。

对成仿吾等人的提议,郁达夫是心存疑虑的,并没有马上表示接受。过了几天,大伙见他没有任何回上海的迹象,就请与他关系甚笃的成仿吾再度进行劝说。1926年11月21日,他的日记是:

午前仿吾自黄浦来,要我上东山王独清那里去等他。等到十一点钟,他来了。大家谈了一些改组创造社内部的事情。创造社本来是我和资平、沫若、仿吾诸人惨淡经营的,现在被他们弄得声名狼藉了。大家会议的结果,决定由我去担当总务理事,在最短的时间内,去上海一

次,算清存账,整理内部。我打算于二礼拜后,到上海去一趟。现代青年的不可靠,自私自利,实在出乎我意料之外,我真觉得中国是不可救药了。

自此,郁达夫辞去广州的教职,回上海整顿创造社出版部的事已基本决定,而且行程也大致有了安排。

广州方面的决定很快传到了上海,遂引起了“小伙计”们的极大不满,不久,郁达夫便收到了周全平的信,信中多是不敬之语和一些诬蔑不实之词,令其十分的不快。1926年11月27日,他这天的日记是:

途中遇仿吾,就同他上清一色去吃午饭。席间谈创造社出版部的事情,真想得没有办法。人心不良,处处多是阴谋诡计,实在中国是没有希望了。这一批青年,这一批天良丧尽的青年,真不晓得如何才能改善他们。

.....

晚上见了周某的信,心里又气得不得了,他要这样的诋毁我,不晓他的用意何在。

双方既然到了水火难以相容的地步,郁达夫也别无选择,只有义无反顾地奋勇而前行了,1926年12月27日抵达上海,稍事休息,即按原定计划去创造社出版部进行整顿改造。1927年1月6日的日记云:

有人来访,谈创造社出版内部整理事宜,心里很不快乐,总之中国的现代青年,根底都太浅薄,终究是不能信任,不能用的。

吃饭后去创造社出版部,又开了一次会,决定一切整理事情自明朝起实行。

因未来上海之前,创造社元老已对“小伙计”们抱有成见,心存不满,所以,郁达夫来上海后便处处感觉到他们所作所为都不顺眼,其言语也多不入耳。1927年1月11日的日记是:“在出版部里,又听到了一个恶消息,说又有两三人合在一处弄了我们出版部的数千块钱去不计外,还有另外勾结一家书铺来和我们捣乱的计划。心里真是不快活,人之无良,一至于此。我在出版部里等候了好久,终没有人来,所以于五点前后,郁郁而出,没有法子,只好去饮酒。喝了许多白干,醉不成欢。”

这里所言的“小伙计”勾结一家书铺来和他们进行捣乱的“计划”实属

## 郁达夫与王映霞

误传，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人南下广州后，周全平、潘汉年、叶灵凤等“小伙计”，虽身处繁华喧闹的大上海，但感觉“却比行走在茫无边际的大戈壁中还觉得无聊寂寞”。茶余饭后，一商量便在创造社出版部之外又成立了一个小组织，名曰“幻社”。主要活动有两部分：

一是编辑“幻洲丛书”。以叶灵凤、周全平为主，仰仗光华书局为印刷发行的平台。如叶灵凤的小说集《女娲氏之遗孽》、《鸠绿媚》，周全平的《苦笑》，戈仲平的《海夜歌声》，金满城的《我的女朋友》，洪为法的《长跪》等都曾列入丛书之内。丛书一式的36开本，毛边而横排，装帧设计均出自叶灵凤之手，不仅封面非常的漂亮，就是书中的环衬、扉页等，亦都相当讲究。

二是创办《幻洲》半月刊。内容分作上下两部。前者为“象牙之塔”，由叶灵凤主编，专载纯文艺的作品；后者为“十字街头”，由潘汉年主编，主要刊登短小精悍的评论随笔。

尽管“小伙计”们曾在《洪水》上登出启事，说“幻社”与创造社无任何瓜葛，但人们还是把它看作是分支机构。这样也就很自然地引起了“元老”们的不满，都以为他们在怠工，搞小组织。再加上“年终时局不靖，创造社被封了一次以后，风鹤时惊，弄得一般办公者，无心专业，所以结算下来，却只够开销伙食。”（郁达夫《创造社出版部的第一周年》）

鉴于上述原因，郁达夫从广州回沪后，未经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武断地将周全平、潘汉年逐出了创造社出版部。

此番举措，首先引起了叶灵凤的愤愤不平，以为郁达夫仅凭道听途说之言，下马伊始，就全盘否定了他们为创造社出版部在上海的发展壮大所作的努力和立下的汗马功劳，一见面便话不投机，不欢而散。郁达夫1927年1月12日的日记曾记录下了这一幕。

酒后又去创造社，和叶某谈判了一两个钟头，心里更是忧郁，更觉得中国人的根本的卑劣……

这里所言的“叶某”，指的就是叶灵凤。

周全平、潘汉年等人与郁达夫没有什么私交，与之进行抵阻尚情有可原，而素有其私淑弟子之称的叶灵凤，也为整顿之事与他反目为仇，这不能不令他十分震惊和悲哀。

叶灵凤,南京人氏,1905年生,在上海读美术专科学校时与创造社元老们认识,自称与郁达夫的关系乃在师友之间。他在《达夫先生二三事》中曾意味深长地回顾了郁达夫对他的“厚爱”和关照。

……我那时也住在民厚南里叔父的家里,晚上在客堂里“打地铺”,白天背了画箱到美术学校去学画,下课回来以后,便以“文学青年”的身份,成为达夫先生那一间前楼的座上客了。他是不在家吃饭的,因此,我们这几个追随他左右的青年,照例总是跟了他去上馆子。他经常光顾的总是一些本地和徽帮的小饭馆,半斤老酒,最爱吃的一样菜是“白烂汙”,所谓“白烂汙”。乃是不用酱油的黄芽白丝煮肉丝。放了酱油的便称为“红烂汙”。我记得有一次到江湾去玩,在车站外面的一家小馆子里歇脚,他一坐下来就点了“白烂汙”,可见他对于这一样菜的爱好之深。

另外,据叶灵凤在《我的藏书长成》一文回忆,他收藏书籍的“最初的胚芽”,也是郁达夫培育的。他的散文和小说很明显带有“郁达夫式的笔调”。

彼此就是这样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也因郁达夫对创造社出版部的“整顿”产生了不同意见,继而“反目”为仇。

广州的教职辞去了,上海的整顿又不顺利,真是进退维谷,心如枯井,下一步棋该如何走,就连他自己也不清楚。王映霞的出现,则使他柳暗花明,再放异彩。

郁达夫与王映霞相识是在他到上海后的第二十天。

初到上海时,虽为整顿创造社出版部的事弄得焦头烂额,苦不堪言,但在稍为闲暇之际,他仍忘不了到书店去转悠转悠,苦中寻乐,借机消愁。所去的书店,除四马路上的中国古旧书铺和专卖新文化书籍的小店外,最多的则是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经营的內山书店。是在这里,遇上了他和王映霞的红线牵引者——孙百刚。

孙百刚,杭州人氏,1921年东京留学时与郁达夫相识。二人相处虽仅一年有余,却十分相知,来往也很密切。后来随着各自的回国谋生,关系也就渐渐疏远了,但相互都没有忘怀,也不时地留心于对方的行踪。

1927年初,孙百刚暂住上海期间,为编一部书稿的事,常到北四川路底